

明代宗藩私离封地与越奏问题述论

雷炳炎^①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明自永乐始,宗藩地位急剧变化。明中期以后,宗室更是被禁锢于一城之中,不得擅离封域,亦不得从事四民之业,成为坐糜岁禄的寄生阶层。宗室奏事,亦有严苛的规条限制。但明王朝的禁条,从来没能遏止住宗藩的私离封禁和越关奏扰,特别是正德以降,宗禄问题困扰明王朝,宗藩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难题以后,宗藩私离封地、越奏日益加剧,成为难以刹住的风潮,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恶果。

关键词: 宗藩;禁令;私离封地;越奏

明初,朱元璋分封同姓子弟,数十年间,形成弱干强枝格局。建文帝逊国后,削藩成为永乐以后几代皇帝要解决的课题,削弱宗藩势力包括禁止宗藩典兵;宗室不得从四民之业;限制宗室自由,宗藩不得出城、入朝;禁止王府与官府交通,等等,成为独具特色的明代藩禁制度。有明一代,宗藩典兵虽酿成靖难之变,但朱棣即位后,对宗藩军事权力大加裁抑,并规定宗藩“不许擅役一军一民”,^{[1]卷19 永乐元年四月丁卯}其后进一步剥夺宗藩兵柄,革除藩王护卫,宗藩军事权力愈见微弱,虽有宗藩谋反发生,但不足为一代之患。洪武时,“未尝不许宗藩出仕”,诸王不仅手握兵权,而且可以授官。宣德初年,汉王谋反,“当时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遂废出仕之令”。从事四民之业的禁令,一方面,限制了宗室才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使宗藩成为了坐糜岁禄,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明朝宗藩私结官府,谋取利益,危害社会的并不多。甚至“诗礼故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府结亲。”^{[2]卷119 1142}严格限制宗藩行动自由是宣德以后之事,明制:“亲郡王以及将军、中尉俱不许擅出城郭。”^{[3]卷7 276}诸凡出城省墓、田猎、游历、宴享、奏事,均在禁止之列。一开始,宗藩冲破禁条,擅离封地尚不多。正德以后,宗藩私离封禁,越关奏扰成为明代严重的社会问题,朝廷疲于应对,打乱了明王朝正常统治秩序,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 擅离封禁

明初,并无诸王出城之禁,亲王亦间以庆贺入

朝。洪武六年,定诸王朝觐“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周而复始,毋得失序”。边塞诸王“无警,则依期来朝;有警,则从便,不拘朝期”。^{[4]卷56 972}朱棣即位以后,鉴于建文帝“疏忌宗室”,“永乐朝,亲王入觐者不绝”。^{[5]卷4 106}至宣德年间,汉王朱高煦以反叛被诛,遂废诸王定期朝觐制度。正统十三年,荆王奏迁国三年,“欲诣京朝见,上以道远复书止之”。^{[6]卷165 正统十三年四月丙寅}英宗复辟后,天顺时,曾特诏襄王入朝,襄王为宣宗同母弟,景泰间,“曾有疏上章皇后,请视南城起居,又疏劝景帝朝南内”,英宗深感其诚,故命入朝,“情礼优渥”,此后,亲王不朝者近四十年。弘治八年,因仁寿太皇太后思念自己的儿子崇王,孝宗曾下诏召崇王入京,亦由于朝臣反对而终止。^{[6]卷165 正统十三年四月丙寅}正德四年,明确规定:“亲王朝觐,虽载祖训,英庙之时,亦尝一举,然久已不行,以故比者崇王请朝,则贻书免之,今后凡亲郡王请身入朝者,并免,著为令”。^{[7]卷58 正德四年十二月庚戌}

明制:“亲王非迎驾及扫墓,不许出城一步。”^{[5]卷4 107}凡天子行幸至藩府境内,亲王例应出府迎谒。明初,永乐帝巡幸北京,过济宁州,有鲁王来朝。正德间,“武宗巡幸最繁,然未闻有亲王朝谒一事”。嘉靖十八年,世宗驾幸承天府,“敕谕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驾”,于是,赵王、汝王、周世子、徽王、唐王皆出府,跪迎于道旁。^{[5]卷4 106}

然而,对于宗室出城送葬、扫墓,明王朝也是明

① 收稿日期: 2009-02-14

作者简介: 雷炳炎,男,湖南常宁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文限制的。据《明史》记载,宗藩“出城省墓,请而后许”。^{[8]卷120}《礼部志稿》也明文记载:“各王府郡王以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类,俱先期奏请,得旨乃行”。^{[9]卷77}但明代中期以后,宗室遇丧葬、祭扫之事,多有不请自行。分封四川的蜀府,自蜀献王以后,“每遇亲丧,亲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经奏请”,在四川地方官奏告蜀府违制后,“蜀王亦自以本府相承故事为解”。^{[9]卷77}景泰时,因要为妃择坟地,不经奏请,安塞王就私带内使人等前往贺兰山察看。^{[6]卷243}景泰五年七月壬戌天顺时,宗室成钊,因罪锢凤阳高墙的父亲病危,微服走视。^{[10]卷4}弘治时,襄王祐材未经奏请,清明时“出城祭扫先墓,四日始归”。^{[11]卷62}弘治五年四月甲寅

宗室出郭不乏游猎、宴享之辈。自然,这也是明王朝明令禁止的。但是,宗藩擅离封地,外出田猎、游宴却大有人在。景泰三年,蜀府华阳王“尝率妃与宫人并军丁百余,出城围猎”,越五日而归。^{[6]卷212}景泰三年正月甲寅六年,代府昌化王乘大同巡抚等官出外行礼,“径至帅府周围观视而还”。^{[6]卷260}景泰六年十二月庚子正德三年,淮府顺昌王“以迎敕为名,出城游玩”。^{[7]卷41}正德三年八月癸酉据陕西巡抚都御史张潮反映,嘉靖时,靖江王府有奉国中尉曾两度违例出城,并潜至南京。^{[12]卷8}嘉靖六年七月辛巳韩府乐平王府有奉国将军“以三月终背父出游,莫知所之”。^{[12]卷466}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壬寅韩王常出郊田猎,以致宗人相慕效之,韩府宗室冒禁出城,成为司空见惯。^{[12]卷558}嘉靖四十五年五月戊午

宗室出城,“非挟耒耜以缘南亩,亦非操资本而逐什一”,^{[13]礼部卷4}其意图亦不止于田猎、游宴。纵观明王朝的藩禁政策,宗室被禁锢一城一地,如同羁押的罪囚,确实值得同情。顾炎武也批评明王朝对待宗室“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于国域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14]卷2}但禁止宗藩出城,其主要意图在防范、裁抑、箝制宗藩。明王朝自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以藩王身份登上皇位后,仍有一些宗室步燕王后尘,兴兵反叛,其中有亲、郡王,还有将军、中尉。而正德年间的宁王朱宸濠,正是通过四出活动,结交刘瑾、钱宁诸权奸,“十余年间,棋布星罗,贼党几遍海内”,^{[15]卷44}并且在南昌纠合起十余万反叛之师。当然,明王朝对宗室出郭,滋事扰民,甚至作奸犯科也是有所担心的。戚元佐在《议处宗藩事宜疏》中,论及明代宗室出城出郭之禁出现的原因时,就强调“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郭者,为近日放纵不法者设也”。^{[2]卷388}4202明初,允许亲王入朝,但王府须“自备

饮膳,其随从官员军士盘费、马匹草料,俱各自备”,并规定“毋得干预有司,恐惹事端”,^{[4]卷59}973其目的显而易见。但是,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禁令并没有杜绝宗藩非法越禁,相反,宗室擅离封地日益增多,其影响也不仅限于违犯禁令本身。宗室滋生事端,抢盗民间,为害地方,可谓无恶不作。他们“占民产,骗民财,违明例,虐民生,既属非法,历乡村,犯不测”。^{[13]礼部卷4}562早在天顺年间,就发生过宁府临川王磐烨“擅出城外,辄入人家索取财物”之事。^{[6]卷293}天顺二年七月乙未万历时,韩府襄陵王有镇国中尉“越禁骚扰驿道,诈骗财物”。^{[16]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有的宗室私出封禁,还纠集王府人众,出城公开抢夺。他们“三五成群,数十聚众,或哄然入室,围绕掳掠,或攫金于市,旁若无人,有司亦谓其无肆,莫犯其锋,百姓但任其鱼肉,愀然饮恨”。^{[13]礼部卷4}562正德时,岷府黎山王彦漠、镇国将军彦淮与安昌王“收蓄奸徒,从舆为非,……勒取民财,莫敢谁何?”^{[7]卷90}正德七年七月丙子嘉靖时,西河王府奉国将军表寨等,“招纳亡命,剽劫为盗”。^{[12]卷200}嘉靖十六年五月乙未据巡抚都御史蔡汝贤奏称,万历时,靖江王府中尉经扣等,“结党横行,昼夜若狂,聚众殴打察使顾问几死,……又逼勒程布政改换禄帖,言词悖慢。抢夺财物,殴打平民,城震惊,人心凶凶”。^{[16]卷229}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壬戌有的宗室私离封禁后,选择关津通衢拦路抢劫。正德时,庆成王府镇国将军中尉知燭“招集无赖掠货于途”。^{[7]卷117}正德十六年三月辛酉宗室招纳亡命,“邀截河口,或沉其船,或夺其货,或打伤人命,作梗关梁,商民畏遁,致国课无从取”,^{[13]礼部卷4}563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有的宗室离开封禁,把持地方商税,严重妨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弘治时,松滋王府几位镇国将军“招引群小,夺军民商贾之利,人苦之,至有缢死者”。^{[11]卷60}弘治五年二月戊申周世子安潢,“乃擅差典史史澜监修,复遣人于河次提载百货而税之”。^{[11]卷120}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甚至出现宗室成群结队擅离封禁,冲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员之事,这些情况在嘉靖以后曾频繁发生,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二 越关奏扰

明初规定,凡王府奏事,“王遣使至朝廷,不须经由各衙门,直门火者速奏闻,若不奏闻,即系奸臣同党。”^{[17]卷4}《皇明祖训》朱棣即位后,更定祖训成制,明令“王府有事,发行三司等衙门随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9]卷16}正统以后,宗室陈奏的有关规定更细更严,“宗室非机密重情不得径奏;郡王以下

有事,非启亲王不敢奏;袭爵请名封等事,非长史启王不敢类奏;仪宾不敢托郡、县主、君名陈奏。”^{[9]卷16}除事干亲王或所奏系机密重情外,王府陈请的大小事务须先启亲王,无故私自赴京奏告者,谓之越奏。

明代中期,宗室越奏的事例,明实录中可谓俯拾皆是。然而,就宗室越奏数量的多寡和明王朝对宗室越奏所持的态度来看,嘉靖前后则有明显的变化。

宣德时,明王朝取缔了宗藩定期朝觐制度,其后,宗室擅离封地频繁发生,各藩府越关奏扰之事也随之产生。早在正统十一年九月,被禁住的辽庶人长子就擅离祖坟,“欲赴京自诉”。^{[9]卷75,303}十四年,广通王府教授汪敬亦奏告,“广通王等各往东门出城,称欲赴京奏事”。

^{[6]卷184 正统十四年十月乙亥}天顺时,代府左长史李滋反映:代府各郡王奏事,“止令长史司出批,所奏事情并不经本司看验”,有的郡王弄虚作假,“中间有奏一事而夹奏二、三事者”,“稍有不从,辄将实封送赴”,“甚至镇国将军以下亦有不由郡王,而径令家人、校尉赍本诣京者”。^{[6]卷306 天顺三年八月戊辰}

成化以后,宗室私离封地越奏愈加严重。成化八年,代府灵丘王府有将军三人“擅出平阳府城,于佛寺止宿,言欲赴京奏事”。

^{[9]卷79,401}十一年,鲁府有镇国将军因与护卫指挥鲍珣争地,“赴阙陈诉”,鲁王遣人追回后,还是有一位将军“潜赴阙具奏”。^{[18]卷141 成化十一年四月丙申}宗女甚至也离京远出。成化十九年,辽府宁福乡君诣京,奏告其兄已封为长阳王,本身该进为县主。^{[18]卷246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戊戌}

两年之后,寡居在家的宁福县主无视礼法,又私赴巡抚衙门,告讨监利县空地,“回到监利不归”。

^{[18]卷256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戊子}弘治时,郡县主君,“多有听人拨置,赴京奏扰”。

^{[9]卷79,417}弘治以前,明王朝对宗室越奏重在防范而不重罚治。朝廷三令五申,无论是直接向王府发布敕命,还是以书信诫谕亲王,更多的是申明宗室奏事应遵依规制,要求各王府约束本府宗人,杜绝私自越奏事件发生。针对越奏宗室,则采取降敕切责或警告的方式,但对王府官员及相关人员,明王朝则不姑息迁就。成化十八年,灵丘王府三位将军欲赴京奏告,宪宗下令究问该府教授及守城官罪。^{[9]卷79,402}

武宗即位后,鉴于各府入京奏诉成风,于是命礼部移文各王府,“敢有仍前故违者,并治之”,^{[7]卷8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乙丑}随后又下旨,命将军以下越诉者,“不必馆馈,止令办呈官送回本府严加管束”。^{[7]卷8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辛未}正德十二年以后,下令对越奏宗室作出处理:其一,对奏诉者“原词立案不行”,

其二,“仍将禄米量行减革”。^{[3]卷7,276}

嘉靖时,明廷加强了对宗室的监管力度。对违禁越奏宗人,除事后依照正德十二年的办法处置外,遣官伴送回府时,尤其重视对差官和犯宗的约束。嘉靖元年,规定犯宗遣送回府“只给口粮脚力,不许沿途需索,轮马供应”。

^{[12]卷14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为了从源头上杜绝藩府的越奏现象,十五年,明世宗敕谕各王府“令辅导官置立稽考簿籍一扇,凡五日,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庶人亲自赴府画押,如有称病不到者,即时差官询问明白,朔望朝谒,听王逐各点闸,如有私出城郭者,差人追回监禁,具奏处治”。

^{[12]卷191 嘉靖十五年九月己未}二十四年,明王朝又把这种监管办法进一步推广到王府仪宾头上,规定:“今后各府仪宾务要照将军等例,五日报府画押,如或不到,许即时差人查究下落,其有无故而推托者,即拘伊亲、邻里体访勘明”。

^{[9]卷79,767}不仅如此,嘉靖时也一改正德以前对越奏犯宗的宽恕态度。一方面,加重了对犯宗的经济制裁。嘉靖元年,重申对来京奏扰人员除“奏词立案不行”外,仍对涉罪之人,“量减禄米”。十二年,又下令对所有违例赴京宗人,“其应得禄米,以出城日为始,裁日住支,至回府发落之日复支,中间旷日不准补给”。

^{[3]卷7,277}另一方面,对越奏人员视情节予以惩处。嘉靖十一年,下令对越奏犯宗,“情轻者革去爵秩,情重者发送高墙”。

^{[3]卷7,276-277}其后,犯宗或发送高墙,或关押闲宅,或革去爵秩、宗禄。然而,明世宗对犯宗的重谴,并不能刹住藩府宗人私离禁地,赴京越奏或赴省城诉告之风。与正德以前相比,嘉靖时的宗室越奏,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态势。嘉靖元年,世宗在发给礼部的上谕中,就明言各府宗室“近多越关妄奏”,^{[9]卷6,96}

二十九年,据礼部给事中杨思中反映,数月之间,赴京奏扰者有十余起。^{[9]卷81,425}在宗室人口众多的周、晋等王府,越奏情况尤为突出。三十一年,前三个月内,周府赴京越奏的就有十人之多。

^{[12]卷384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晋府宗室甚至结队成群私赴京城。嘉靖十四年十月,晋府宗室奇渭、奇决等十人结伴,“越关入京,诣午门驰道伏奏”。

^{[12]卷181 嘉靖十四年十月壬辰}宗室越奏人员,除有少数郡王外,大多为王府的将军、中尉、庶宗,也有少量的郡县主、君、仪宾人等。甚至一些藩府嫔妃、将军夫人等参与其中。《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时,“各处宗室、将军夫人等项往往不守礼法,擅离封域,越关赴京奏扰”。

^{[12]卷191 嘉靖十五年九月己未}而张瀚的《松窗梦语》记载也说:“不惟宗人逾制犯禁,

越关妄奏,而嫔妃姬妾,亦有以内臣护送,诣京奏事者矣”。^{[19]卷8,157}由于明王朝对越奏犯宗予以经济制裁,以至出现某些犯宗冒别府之名,赴京渎奏。嘉靖十五年,就发生晋府将军冒称高平王府“赴阙渎奏”。^{[3]卷7,280-281}甚至有宗室私带奸徒,冒充宗人赴京越奏,希图渔利之事。嘉靖四十三年,据怀仁王反映,该府宗室赴京越奏时,就挟带奸徒,冒称宗室三哥子。^{[20]下卷,401}

宗室越奏,多因岁禄逋欠、资身乏策所致,也有因名封婚请不时,告诉不果才忿而赴京,更有一些宗室受利益的驱动而赴京奏扰。宗室不辞千里之遥,前往京师奏告,他们期望朝廷解决本身的实际问题,为达目的,有些宗室出现过激行为,甚至以死相胁。嘉靖中,周府奉国将军安汨“至欲自刎阙前”。^{[12]卷384,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万历时,周府鄱陵王府有镇国中尉“令未名二子小孝哥越关具奏,持刀自抹”。^{[16]卷175,万历十四年六月辛未}为消除来自藩府和地方阻力,实现顺利赴京,有的宗室明目张胆地以武力捍卫越奏行动。万历时,代府饶阳、潞城等王府将军、中尉赴京越奏,奉国将军俊椿等“擅出镇城,项插黄旗,书‘拦挡者斩’”,以致潞城王坐视群宗出城,不敢阻拦。^{[16]卷112,万历九年五月庚午}

正德以后,宗室“倡众出境,越关妄奏”,为什么会成为难以逆转之势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说,是由于宗藩问题久经积累,正德以后发展成为明王朝无法甩开的沉重历史包袱,明王朝对宗藩的种种限制和根治宗藩弊政上的无所作为,使得庞大的宗藩集团成为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宗禄问题是明朝中期以后朝廷议论宗藩的核心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明王朝抱残守缺,始终不愿解除对宗藩的种种禁条,不允许宗藩从事四民之业,宗室只能“仰给有司”,而各王府和地方衙门也难以解决大量无禄宗室的供养问题,加上宗藩奏事手续的繁琐,各王府宗室,有事转奏,难以上达,他们只能选择亲赴京城具奏的方式。

当然,中下层宗室赴京越奏,也与亲郡王不顾宗室冷暖,挟私报复甚至借奏事敲诈密切相关。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六年,郑府长史张铎曾向郑王反映,其长子已到婚、封年龄,然而,由于郑王父子关系微妙,郑王对长子的请封、选婚不管不顾,王府长史“屡以启,王辄忿怒,纪善彭镬、王谅亦因谏劝遭辱”。^{[18]卷81,成化六年元月癸亥}成化十九年,辽府长阳王晋封后,长阳王之妹宁福乡君例当进为县主,“辽王挟私不为转奏,而长史等官亦不为启

劝”。^{[18]卷246,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戊戌}明中期以后,藩府名封、婚禄不能及时上请,有很多是因为亲郡王贪婪敲诈,公开索要未得到满足的缘故。嘉靖时,郑王厚烷就反映:“各府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由亲郡王多方规利,阻泥不行,故有十岁未名,终身未嫁娶者”。^{[3]卷7,277}而一些王府官也“借事需索,巧名抑勒,以恣其丘壑之欲,不满不已”。^{[21]卷66,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午}贫困宗室朝难保夕,又何从措置亲郡王及王官需索的这笔钱物,迫不得已,只能冲破明王朝所设的禁条,走向越奏之路了。

不可忽视,宗室越奏,也有很多是受到利益的驱动,我们姑且撇开宗室赴京具奏,朝廷是否会圆满解决其奏请之事不论,仅就宗室沿途供给和本身向地方衙门需索所得,足以让众多嗷嗷待哺的贫困宗室怦然心动。嘉靖时,礼部官员在议处越奏宗室时,就说宗室越关“计其驿递需索所得,倍于岁禄”。^{[3]卷7,279}尽管嘉靖元年,就规定对于由京城遣送回府的犯宗:“只给口粮脚力,不许沿途需索,轮马供应”。但据代府怀仁王俊榭反映,嘉靖后期,革去爵秩的犯宗伴送回府时,“辄擅遣白牌,僭称爵号,舆马冠盖,充斥道途,所过关津候吏,无不被需索者”。^{[3]卷7,279}嘉靖四十三年,怀仁王府宗室充鲋以越奏降为庶人,遣员伴送回闲宅禁闭,沿途仍擅起车辆人夫,兵快马匹,多索廪给。^{[20]下卷,401}由于利之所诱,加上王府少数人的怂恿、鼓动,他们毫不顾惜坏法乱纪,宗室越奏日益加剧,进而在嘉靖时发展成为明代严重的社会问题,明世宗君臣为应付处置宗藩越奏耗费了较多的精力,而宗藩问题本身也成为与河患、边患并难处置的明后期三大社会难题,显然,这与明太祖置封设藩的初衷是大相背违的。

参考文献:

- [1] 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 [2] 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 王国典礼[M].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9册.
- [4] 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
- [5] 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 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 [7] 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 [8]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下转第19页)

上的支持。

于右任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是与新闻活动紧密相联的,但是于右任首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领袖,许多重大事情等待他参与,不允许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但仍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根基,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转换,成为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质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他衷心希望记者可以利用手中的笔和纸这个武器在新闻战场上厮杀,为民主革命作舆论先导,早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综观于右任的一生,他从未放弃过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对我国早期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革新,为我国早期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办报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办报思想。他的办报活动和办报主张对中国

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洪干圻.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 韬.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郑观应.日报下[M]/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0

[5] 于右任.中国万岁 民主万岁[M]/民立报.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于右任.论国民最近之心理与今后之责任[J].文学遗产,1996(1).

[7] 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M]/社会科学论坛.北京:中国书店,1986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 15 页)

[9] 礼部志稿[M]/四库全书:第 597-59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1] 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12] 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13] 神庙留中奏疏[M]/续修四库全书:第 47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顾炎武.亭林文集[M].民国石印本,1913

[1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17] 昭代王章[M]/玄览堂丛书初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

[18] 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19] 张 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0] 宗藩条例[M].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59 册.

[21] 明熹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责任编辑:骆晓会)

ABSTRACTS

(1) CHEN Du-xiu's Pondera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ode of Soviet Russia

LUO Xiao-hui(004)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CHEN Du-xiu disapproved Comintern's guiding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mode of Russian revolution. He advocated that a backward country develop Capitalism first to construct Socialism and criticized Stalin's dictatorship and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CHEN's advocacy and criticism, most of which was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shows his good insight, precise prediction and conscience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his tragedy.

Key words CHEN Du-xiu; mode of Soviet Russia; Socialism; democracy; Stalin

(2) On the Role of Mysteriou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LU Jun-na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ough not scientific, the mysteriou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God emblem acted as the banner to unite the peoples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 tribe leader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improve their own status so as to successfully establish their sovereignty; king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rule the people; the subjects of the king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achieve their wishes.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the mysterious culture; harmonious society

(3) Study on Imperial Clans' Illegal Leave from Fief and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LEI Bing-y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Yong Le period in the Ming Dynasty, royal clanmen's status dramatically chang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mperial clans were not allowed to get away from their domain and not permitted to get engaged in industries of the four callings, and they became a sitting-year-old parasitic class who just wasted their salaries. There were also some harsh bans on their memorial presentation. But the rules were always in vain. Especially after Zheng De period, the Ming Dynasty was perplexed by increasingly worse problems of the imperial clans' salary, illegal leave from their fiefs and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

Key words imperial clan and vassal state king ban; illegal leave from fief;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